

【论 文】

高校情境下的族群认同

——以 E 大学藏族学生群体为例

刘琪¹ 卢惠仪²

摘要：高校少数民族学生，近年来引发了学者不少的关注。既有的研究大多从文化适应的角度讨论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过程，却很少带有长期的视角，观察这个群体的学生在几年的学习生活中族群认同的形塑过程。本文以 E 大学的藏族学生为例，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描述在具体社会情境下族群认同的塑造与展演，以及他们怎样在这个过程中维持他们的族群边界。我们发现，支撑藏族学生族群认同的，不单是与生俱来的藏族身份，更重要的是具体情境下互助的需要，以及文化的再创造。在以群体为单位的实践中，族群认同会不断被强化。

关键词：族群认同 族群边界 免费师范生 藏族 社会情境

一、问题的提出

1. 族群与族群认同

“族群”（ethnic group）是出现于 20 世纪初并最初在美国流行的词汇，用于表示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又保持着内部认同的群体。³在世界多民族国家中，受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少数民族大都面临文化融合和民族认同的问题。关于少数族群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特定的情境（circumstance）中建构与协商自身的认同与身份，现存的理论对此做出了颇多解释与论述。

一般认为，族群认同有其一般成分与特殊成分。⁴族群认同中的一般成分是具有族群普适性的因素，而族群认同中的特殊成分则是某一具体族群认同过程中必须面临的问题。族群认同中的一般成分主要包括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与族群卷入（社会参与和文化实践）等；而族群认同中的特殊成分则因具体族群的不同而不同，包括族群文化、族群风俗、族群历史等，就是族群认同中的特殊成分。

对于特定族群的个体成员来说，其族群身份有两个来源，一方面为内在的自我认同，无论是原生的还是工具主义的，产生于血缘、家庭、语言、价值观以及社区环境和集群行为的影响之中；另一方面为外部认同，来源于非群体成员对族群成员社会差异的感知，这种差异主要是在文化上，包括语言、习俗、观念与价值倾向、生活方式等方面。⁵

早期以格尔茨（Greertz）为代表的原生论（primordialism）认为：族群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主要根植于族群文化并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根基性情感联系和认同，强调“原生情感”与文化象征意义的内在因素。⁶

这种视族群性（ethnicity）为固定不变、静止不动的观点，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就遭到了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m）的质疑和批判。情境论也称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强调族群成员

¹ 刘琪，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² 卢惠仪，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2010 级本科生。

³ 参见马戎，《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⁴ Phinney J S.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Readings in ethnic psychology*, 1998: 73-99.

⁵ 参见关凯，《族群政治》，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⁶ Clifford Geertz,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族群身份认同是族群以个体或群体的文化标准对特定情境的策略性反应和理性选择。¹

以巴斯(Barth)为代表的建构论(constructionism)则在情境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族群身份认同是在同一社会结构中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²在这样的互动中,族群成员根据文化“异质性”(difference)来划分“我者”与“他者”的界限。这种划分,不完全是族群成员主观的理性选择,还有赖于社会或其他族群的界定,是一种“社会边界”(social boundary)的划分。这种划分,与族群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弱势族群而言更是如此。由于族群成员的身份认同由“社会边界”所维持,因此区分族群的主要依据是它的“社会边界”而不仅仅是语言、文化、血统等“原生”因素,文化可能只是表达族群边界的一种符号与工具而已。³

2. 具体情境下的族群认同

既有关于族群认同的研究,大多从原生主义的特点出发寻找认同感的来源,忽略了外部环境对族群认同造成的影响。巴斯的观点,为我们在具体族群互动的环境下考察族群认同提供了思路。事实上,在外部认同上,每一个群体内成员的成长经历和感受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外部群体环境下也会发展出不同的认同,进而建构出新的族群特征,这些族群特征,可能包含该族群“原生特征”以外的内容。

E大学的藏族学生,正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下产生族群认同的典型案列。E大学(下简称“E大”)是一所位于东部大都市的师范类大学,目前,该校有100余名藏族学生,均为免费师范生,分布在中文、历史、英语、数学、化学、教育等各个院系之中。从大的民族政策来看,自1985年起,国家开始实行内地西藏班政策,每年选送1300余名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小学毕业生到内地各省、市中学学习,并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分别进入大中专院校深造,毕业后返回西藏工作。2007年,国务院有关部门为了加强师范教育、加强对一线优秀教师的培养,同时鼓励更多优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选择从事教育工作,决定在六所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大学率先实施免费师范教育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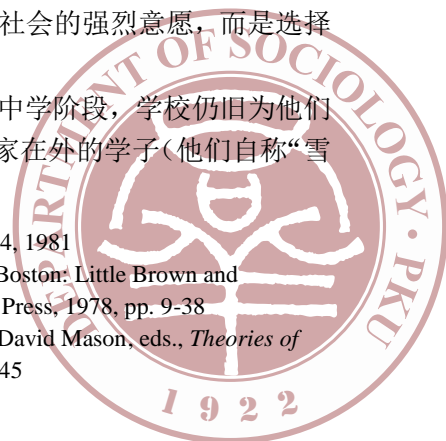
内地西藏班与免费师范生的政策,既为E大藏族学生提供了来内地读书学习的机会,也为他们带来了诸多限制。E大的藏族学生大多数是内地西藏班的,他们往往从小学时起就过着寄宿制、远离父母的生活,高中毕业之后,又按照免费师范生的规定进入E大学习。教育部在《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的第四条中规定:按照国家财政部核定的标准,在乙方四年修读年限内,免除学费,免收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教育部在《协议书》的第十三条中规定:免费师范生“毕业时由丙方安排,在需求岗位范围内进行双向选择,或服从分配,到中小学任教。”换句话说,E大的藏族学生在毕业之后都必须回到原籍当老师,并且,不同于其他省份的免费师范生在找工作时的双向选择,西藏的免费师范生需要通过统一的考试分配工作学校,这就限制了他们在职业发展上的选择可能。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以后都是要当老师的”数次出现在他们的叙述中,而对于分配考试中猫腻的担心、对于未来生活的焦虑,也为他们带来了民族身份之外的共同话题。在必然要回到西藏的政策牵制下,他们没有融入主流社会的强烈意愿,而是选择继续延展自身的族群认同。

在内地西藏班,E大的藏族学生早早就离开了父母和亲人,但在中学阶段,学校仍旧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学校会为藏族学生安排生活老师——指导这些离家在外的学子(他们自称“雪

¹ Jonathan Y. Okamura, "Situational Ethnic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4: No. 4, 1981

² 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M.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9-38

³ Sandra Wallman, "Ethnicity and the Boundary Process in Context," in John Rex and David Mason, eds., *Theories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26-245



子”)的生活,会为他们筹办藏族的传统节日,让他们在内地仍然有家的感觉。在高中毕业成年之前,学校就是这些学生的法定监护人。由于他们的父母通常没有能力来接他们回家,所以他们在初中四年、高中三年的寒暑假期间几乎从来没有回家见过自己的父母亲人。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除了偶尔的外出春秋游活动与周末的偶尔外出(如一些男生会溜出学校翻墙去网吧打游戏),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在学校内,接触到的同学都是藏族的。¹在这样的环境下,除了心理上的想家,他们过的还是被安排好的生活,人际交往也基本限于藏族学生内部。

然而,与中学不同,大学的环境往往更加多元、更加自由,也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选择与能力。学校不再包办一切,这些藏族学生需要面对一个新的、藏汉杂处并且以汉族学生为主的环境,并且需要处理除提高学习成绩以外的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他们往往会感受到缺乏社会支持的孤独。对于汉族学生而言,即使父母远离自己,但家庭在各方面也会给他们提供帮助,如给他们寄衣服、食品等生活用品,在他们生病时回家看病,为他们安排毕业后的工作等等。至少在大学报到的那天会陪他们来,并且有许多过来人的经验可以给他们。与此相反,对于E大的藏族学生而言,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父母都只是普通的农牧民,就算家里能提供不少的经济支持,但是父母不仅离他们很远,也不会汉语,在大学生活、人生规划这些事上能够给他们的帮助微乎其微。在下文中我们会看到,家庭支持的缺乏,使这些藏族学生对于同辈群体有很强的依赖心理。

总而言之,藏族学生进入大学后,所处的生命阶段有了变化,在大学面临着不同的情境,进入新环境后,他们的心理和生活状态都有所不同。E大的校园地处偏僻的郊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这就使校园内部的交流往往比校园外部的交流更为频繁。相对于中学生而言,大学生又处于身心相对自由的阶段,且富有相当的活力与创造力。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E大的藏族学生如何在这样的情境下行动起来,加强了自身的认同,也形成了具有凝聚力的整体。

二、E大藏族学生族群认同的形成与维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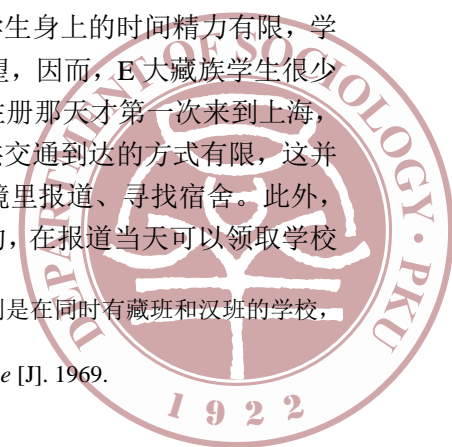
不少人认为,在定义族群的问题上,不能无视群体成员的自我意识和他们自身对有关“我是谁”这类问题的解答。巴斯在1969年出版的一篇序言中指出,在对待族群的问题上,“我们主要地将重点放在强调这样的事实,即:族群是行动者自我赞许(ascription)和认定的归属类别(categories),由此体现族体间有机互动的特质。”²巴斯不仅强调族群是主观上的认同群体,同时也指出族群性(ethnicity)只有在族群互动中才会彰显。换言之,族群性的表达必须是在不同族群相遇之际,因为只有此时,他们各自的成员才会体会到自身与他人有所不同。在接下来的这一章中,我们将描述E大的藏族学生如何在互助的基础上形成他们的族群认同,并通过族际交流中对“藏族特征”的展演不断维持这种认同。这些“藏族特征”既有原生的成分,也有在新的社会情境下的再创造,特别的,在与汉族学生的对比中,“藏族性”也在不断被强化。

1. 基于互助形成的族群认同

与中学相比,虽然大学提供了辅导员这样的人为大学生指导他们的学习生活,他们也会对少数民族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但由于辅导员工作繁忙,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精力有限,学生也难以对这样在行政上管理自己的人产生足够的信任和交流的欲望,因而,E大藏族学生很少直接从辅导员身上获得帮助。以入学为例,E大藏族学生多是报道注册那天才第一次来到上海,他们需要独立从火车站通过公共交通找到E大,E大地处郊区,公共交通到达的方式有限,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校后,他们还要在自己完全不熟悉的校园环境里报道、寻找宿舍。此外,由于E大藏族学生都是师范生,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享受学校助学金的,在报道当天可以领取学校

¹ 在我们调查的这部分藏族学生所上的西藏班中,初中都只有藏族学生,高中则是在同时有藏班和汉班的学校,极少数成绩特别优秀的同学进入汉族学生的班级学习。

² Barth F.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J]. 1969.



提供的床上用品，这又是一道手续。但在这样的一天，每个辅导员要完成上百个学生的入学工作，是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来特殊照顾他们的。

在这种情况下，讲着本民族语言，外貌相似的过来人的帮助就显得尤为可贵。“迎新”是 E 大的藏族学生 9 月份开学的第一件大事，主要由刚升入大二的同学负责。从西藏到上海的火车每天只有一班，每次迎新，都有几个高年级藏族男生前去，拿着 E 大藏族的牌子在出站口迎接前来报道的学生。他们在火车站找好黑车，带新生们上车来到 E 大，带他们到绿色通道报道，安排他们住进寝室，晚上有一个作为欢迎会的聚餐。这看似简单的步骤，对于初到陌生环境的新生，却意义重大。一位藏族学生在他的博客里谈到第一天报道时的情景：

终于考上内地了，怀着好奇，怀疑来到了 S 市。到了火车站后更是彷徨，从没到过大城市的我，感觉突然间很怕，很孤独。但是让我非常惊喜的是，学校有安排接我们的，比这更兴奋的事，藏族学长学姐们自愿来接我们了。他们一切都安排好了，手上举着用藏文写的一个大的“藏”字，非常亲切地向我们跑来。他们帮我们拿行李，在欢声笑语当中把我们带到他们事先安排好的“黑车”里。把我们带到充满接待仪式的 E 大里。之后有更多的藏族同学跑了出来，他们分头行动，帮助不同系别的藏族学生报道。而我被四五个藏族同学首先带到绿色通道，在那里我得到五百块的补助，而且刚好 L 校长来到那里，他给我发了一个 E 大特有的书包和 150 元的购物卡。校长也非常亲近地和我一起照相，说了一些非常感动和激励话语。之后藏族同学把我带到爱心屋，帮我领取生活急需品，去买被子等生活用品。之后亲自送我到宿舍，连床都帮我弄好。之后一个学长（巴丁）说，你先去洗澡。之后我们一起去吃聚餐。然后把我送到洗澡室，要了我的电话号码，他们这才离开了。我洗完澡不久他们就催我来一起吃饭。

我一到吃饭的地方，真的被雷住了。学长学姐们精心布置，把我们吃饭的房间完全弄成了藏式的，熟悉的门帘，经幡，熟悉的藏歌。在内地，在背井离乡之时，在离别的痛苦折磨之时能看到这样的景色，我差点 hold 不住流出感动的泪水。

对于 E 大的藏族学生而言，来到陌生的城市，进入陌生的学校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也会带来心理上的不安全感，而迎新活动，立马为这些新生营造出了“家”的氛围，让他们在同为藏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互助群体。在报道后的几天，新生们（男生）会和大哥们一起打球、吃饭、去大哥的寝室里上网等等。他们中的一些在高中时就认识，并且内地的西藏高中就那几所，大家的求学经历也是很相似的，很快就结成了很好的关系。在新生还没有拿到用于在校园内食堂吃饭的校园卡时，女生也会主动带着学妹们一起去吃早饭。

正式的迎新活动安排在开学几周后。迎新活动非常隆重正式，可以说是在一学期中 E 大的藏族学生的活动中最正式最隆重的，E 大另一个校区的学生也前来参与。早上是老生们准备的歌舞表演，穿着正式的民族服装，学工部的老师被邀请前来观摩讲话，活动场地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安排的。下午所有人围坐在早上演出场地的地上吃零食、喝饮料、聊天，后来又跳起了锅庄。晚上全体藏族学生在学校附近的饭店聚餐，有些人提前回去，剩下的学生则喝酒到凌晨。

隆重的迎新活动促进了新老藏族学生之间的互动，使新生能够迅速融入这个群体。相较于其他大学生通过家庭与学校来完成对于大学生活的适应，这些藏族学生则很快地通过藏族群体内部的帮助适应了大学的生活。在迎新的过程中，他们与同样来自藏区的学生建立起了类似家庭的联结，这种相互依赖的情感在日后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接下来的几年，在这段没有家长陪伴的关键成长时期，藏族同学之间的互相照顾与互相帮助会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在这样的日积月累中，他们建立了比手足之情都要深的情感，可能对兄弟姐妹不好说的心里话都会和当年的同学说。¹

¹ 郭龙岩，“内地西藏班（校）藏族学生跨文化社会化的实证分析”，《西藏研究》2008 年第 5 期。



除了新生入学的互助，之后的互助主要体现在有人生病，碰到比较大的问题时。例如，在一年的入学体检后，两名藏族新生被查出肺结核，被要求住院观察和休学一年。新生住院期间，在医院的照顾均由其他的藏族老生负责，直到家长前来。此前，还有一名藏族学生曾因学业压力过大等原因情绪抑郁，学校的老师就为他重新安排寝室，安排他和另两位藏族学生同住。前辈会叮嘱学弟学妹努力学习，利用已有的人脉帮助他们在学校的勤工助学部门寻找兼职，等等。可以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互助的、类似家庭的群体。

在关于 E 大的藏族群体是如何形成这一问题上，一位年级负责人 J 向研究者表示，07 级之前，E 大并未开始推行免费师范生政策，E 大的藏族学生家庭条件比较好，人数也较少，很多问题可以通过钱来解决，所以不需要相互帮助。但是从 07 级开始，由于免费师范生政策的实施，不少同学的家庭经济能力有限，在学校里需要互相帮助。这一方面印证了互助性在凝聚这个群体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免费师范生的政策对族群边界形成造成的影响。

传统的族群认同理论认为，当人们进入异文化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文化适应的问题：在个体初入异文化时，经历的不统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体开始察觉到异文化与母体文化的差异，并且体验到了来自异文化的压力，在异文化的压力下，他们感到混乱、困惑、无力、孤独，并且易于产生抑郁感，在这一阶段，他们理不出适应新文化的头绪。¹在我们的观察中，固然也看到了文化差异带给这些藏族学生的冲击，但他们更为焦虑并不是外貌与他人不同、普通话不够标准、汉族学生的歧视，而是与其它学生一样的问题：刚开始来到大学时生活和学业上的不知所措和无人求助、课业负担过重、小部分内向的同学不太会跟其它同学相处等。我们可以认为，数十年来的民族平等教育与 E 大相对开放的环境并没有使这些藏族学生产生“低人一等”的感受，他们面临的问题与汉族学生类似，但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却是族群性的，并在客观上强化了族群认同。

2. “藏族特色”的塑造

在 E 大藏族学生的群体内部，他们自认为是“藏族特色”的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这些特点把他们和汉族同学区分开来。

首先，无论他们在集体还是私下的交流中，都会使用藏语。虽然现在的藏语中已经混合了许多汉族的词汇，成为了“杂语”，来自不同藏区的同学也会存在由于方言不同造成的交流障碍，但他们仍旧会用藏语做彼此间最基本的交流。这种交流方式，立马使他们与汉族学生有了直观的区别。

其次，在这些藏族学生看来，他们身上还保留着很多“藏民族的特性”。例如，在研究者第一次参与锅庄舞活动的时候，集体通知的时间是六点半开始，但是，藏族学生 WW 告诉我们，如果通知六点半开始，七点钟去可以了。他毫不忌讳这种“不守时”，在其他集体活动时，一般也会迟于约定时间的半小时至一小时人才会陆续到场。再如，在处理和汉族同学的关系上，一位藏族同学就向研究者表示，在对待汉族上，他们藏族人非常自信，因为觉得自己把很多问题看得看开，而且很大方。他们自称在藏族内部实现了“共产主义”，大家一起外出吃饭或在其他需要共同付款的场景下，朋友之前通常不会考虑太多，谁有钱谁付。但是和汉族同学一起吃饭的时候要 AA 制，这种计算让他觉得没有必要。

最后，除语言与生活习惯之外，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也是藏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的重要“区分项”。在大学期间，虽然已经不能完全保持在家中的信仰方式，但是很多藏族学生都有每天早晚读经的习惯，以及在网上浏览高僧大德的讲座和文章，购买他们的著作。在寝室里，藏族学生的房间里常常是充满了藏香的味道，房间里也有藏民族特色的东西。藏族学生 J 本来与汉族同学住在一起，但后来由于一名藏族学生生病，为了互相照顾，他们搬入了同一间寝室。此后，又有

¹ 徐光兴，《跨文化适应的留学生活：中国留学生的心理健康与援助》，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4-10



其他同学因为不太愿意和汉族学生住在一起而搬入这间寝室。在这间寝室的门外，就挂着红绿相间的类似于绸带的、常见于藏族家庭的装饰物，一进房间便可以闻到浓郁的藏香。每个人的桌上或床旁边的墙上多多少少都挂着一些唐卡、藏文字母、佛像，书架上也摆着藏文书籍。共同的信仰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使他们成为与其它人不同的族群群体。

除日常生活以外，藏族学生之间共有的聚会与节庆，更是强化了他们作为整体的族群认同。其中，锅庄舞与藏历年是最重要的两项。

从2007年开始，E大的藏族学生便会在每个周末的晚上举行锅庄舞活动。07级是第一届的免费师范生，也是从这一级开始，E大的藏族学生多了起来。07级的负责人VN回忆，自己当时组织大家筹集了八百多块钱，买了两个大音响，然后挑了几个人互相学习各个地方的舞蹈，学会了以后就带着大家一起跳，慢慢活动就搞起来了。目前，E大的锅庄每两周举行一次，每隔一周的周六晚在E大的西操场上举行，时间从18:45左右一直持续到十点体育场熄灯。

人员组织上，活动由两位大三男生擅长锅庄的JW和WO负责，由JW发送飞信通知，两人将音响从宿舍拿到操场并带领大家跳舞，活动后收回音箱。人多的时候和学期刚开始的时候，会分为内圈和外圈，内圈主要由大三年级的同学进行领舞。

在锅庄舞进行的过程中，女生倾向于在舞曲的间隙聊天，男生则会在舞蹈的过程中以肢体上的互动（接触、夸张的动作）等等来交流感情，以及一起应和舞曲发出“嘿嘿”的吼叫声或是模仿音乐里的其他声音来彼此逗乐。不想跳舞的同学和跳得累了的同学则会坐在旁边的草地上，围成一个个小圈子聊天，可见锅庄活动的集体凝聚的意义超过了跳舞本身的意义。

在活动开始之前，几个大三的男生女生需要走一百多米去接音箱的电源，活动结束后将音箱收回。这几个男生女生都是群体中相对核心的成员，平时参与集体活动较多，经常担任负责人的角色，即使其他同学迟到早退，他们也不会。在一次锅庄结束后，研究者与他们一起收线和拿音箱，那天他们兴致比较高，一起出钱买了奶茶和炸鸡块之类的零食，邀请来参加锅庄的藏族学生在草坪上坐着聊天，一直聊到将近十二点。藏族学生群体之间的聊天，大都聊的是一些笑话之类的调侃，喜欢在草坪上席地而坐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们身上与家乡的关联。

每一次锅庄舞的活动，放的都是藏族的传统锅庄音乐，野性而奔放。音响的声音很响，离开一百米都能听得很清楚。周六晚上有不少人来到操场上跑步，基本上每一次活动都会有感兴趣的非藏族学生（至少五至十位）驻足观看、拍照，也会有人上前询问，或者是跟在外围模仿锅庄的动作，进入圈内跳的人非常少。在跳的过程中，藏族同学并不会很热情地主动向他们介绍锅庄或是教授他们动作。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些藏族学生一旦与你结为了朋友，便会非常热情，但他们对于陌生人并不会主动接触，尤其是在这样异文化的环境下，陌生的都是汉族学生。有人会问活动的时间，但是除了研究者外，并没有坚持每一次都前来参与的非藏族同学。可以说，想要通过参与锅庄来进入这一群体，与他们结成朋友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日常的锅庄舞以外，一年一度的藏历年，则是藏族学生最欢乐的日子。与所有远离家乡的学子一样，E大的藏族学生会在新年这样全家团聚的时节无比怀念家乡。但由于藏历年时汉地多在学期中，他们早就习惯了在外过年。

一位西藏内地班的学生鹰萨·罗布次仁这样描述他在内地过的第一个藏历新年：

再过两天要过年了，很兴奋，因为我们可以过两个年。以前在曲松县好像没听说过春节。而到了内地，春节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春节和藏历新年，很少在相同的月份里，所以意味着我们可以有两次假日。假日里，有会餐，有联欢会，我们当然很喜欢。这次拉萨，即藏历新年，是我第一次在外面没有和家人团聚的拉萨。

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大袋新年礼物，每个班集体发了一个“五谷斗”，用来班级同学之间百年。初一早上，舍友们起得不早倒也不晚，有很多大哥哥大姐姐都来给我们拜年，他们穿着藏装，捧着“五谷斗”，拿着点心和饮料。我们屋里没怎么布置，只是在门上



贴着寝室长买来的红纸“福”字。¹

在我们进行田野观察的三年中，2012年的藏历新年，是E大第一次允许藏族学生公开过新年。学校为他们提供了校内的场地，有校领导前来参与，活动结束后被作为新闻报道在校园网和校报上宣传。

正式的活动是一个下午的联欢会，藏族学生会在之前的几个月准备唱歌、舞蹈等节目，自己写藏文和汉语的主持稿。他们组织活动的的能力也都是从内地西藏班开始就培养起来的。一进入联欢会场地，就被他们奔放热情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所感染，外面和场内的四周也挂着藏族特色的装饰。联欢会上，是他们仅有的可以穿上西藏民族服装的时候，他们可以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表演节目，“五斗谷”就放在舞台前，校领导发言时请他作为长辈为大家祝福。最有民族特色的是他们的舞蹈，排练合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他们抽出晚上的课余时间排到很晚，但他们乐此不疲。当天联欢会的时候，台上的演员开心地表演专业性很强的舞蹈，台下的同学们聚在一张张桌子前，吃着准备好的零食、饮料，平时不一定能聚齐的大家在新年时一定能聚齐。

在联欢会快结束的时候，大屏幕上播放视频回顾了前一年支教的视频，这对于整个集体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参见下文）。结束之后，大家又在舞台上围成圈跳起了锅庄舞，直到很晚。

相较于锅庄舞这种学生自发组织的活动，藏历年的聚会，则会受到学校各项规定的限制，并不是每一年的藏历年都能像2012年这样庆祝。在某种程度上，2012年的藏历年联欢会，也是E大为了“民族团结”而刻意进行的表演，但藏族学生似乎并不在意背后的原因，只要学校允许他们联欢，他们就足够开心。事实上，在学校的其它各类文化演出中，藏族学生也乐意受邀参与，这些表演的通常会具有浓厚的藏族特色，可以非常直接地把他们与其他民族的活动区分出来。这些具有“藏族特色”的活动，虽然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社会情境，但在新的社会情境中，又被重新“发现”与“再造”，以新的方式塑造了藏族学生的族群认同。

3. 族群认同：从维持到展演

前文描述了E大的藏族学生如何通过塑造了自己的族群认同，接下来将要描述的，则是他们如何有意识的将自己的族群身份展现出来。E大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与鼓励创造的校园氛围为他们提供了舞台，而他们也利用了E大的资源，发扬藏族文化，也进一步巩固了族群的身份认同。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三项活动：藏语班、支教、实习交流会。

相对于其它年龄层和职业而言，大学生正处于人生定位逐渐形成，自我意识逐渐明确的时期，而E大的藏族学生恰好也是在这段时间对自己的藏族身份形成了越来越强的意识。这种意识源于与其它同学的对比，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与其他人不同，也通过互助建立起了以族群为单位的同辈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对于藏语的掌握并不能令人满意。此外，E大作为一所师范类院校，面向西藏招生的都是师范生，E大的藏族学生毕业后都将走上教师岗位，培养的是藏族的下一代，这使他们有更强的文化意识。从07级起，由于免费师范生政策的开始，E大的藏族学生数量日益增加，他们寻求一种集体的认同。在有了几年固定的活动与稳定的集体感后，他们又寻求更加凝结着民族情感和文化的藏语课作为日常的活动形式，即藏文课。

对于E大的学生来说，藏文课不仅是一种集体的认同，更凝结着民族的情感。汉语对于藏族大学生来说是首先是一种“交流工具”，他们必须使用汉语完成各门课程的学习。通过至少十年的汉语学习，可能不少同学对于汉语的有了情感上的欣赏，但是藏语对于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文化象征”，是族群成员之间相互认同的重要文化特征，寄托着他们对于自身所属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的深厚感情。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虽然没有强制的力量不允许他们使用母语，但是他们不得不在中学时使用汉语学习除藏语课之外的课程，在大学时使用汉语学习所有课程。同时，他们的家乡所在地由于行政的强力，汉语的冲击越来越大，传统语言和文化逐渐流失。他

¹ 鹰萨·罗布次仁.《西藏的孩子》，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P70



们希望通过自身语言的学习联结自己与家乡的关系，表明自己“真的是一个藏族”。

时至今日，E大藏族学生的藏语课每周一次。课上，会有两三位高年级藏语水平较高的学长学姐担任老师，他们通常是非内地班的，因此对于藏语的掌握程度更高。他们会事先准备好课件和授课内容。由于藏语的“杂化”问题比较严重，生活在内地的学生不知不觉会在说藏语时夹杂着汉语的词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上课的内容会着重讲授词汇这些出现频率高，但大家习惯于汉语表示的词汇如何用藏语说，听课的学生会记下词语并造句练习。

在研究者参加的一次藏语课中，所有人首先集中在一起看了一段全藏文的视频，内容与西藏的大学有关。此后，授课者在小黑板上讲解视频中的生词，先讲解意思，然后安排大家造句。参加的二三十位同学基本上都在认认真真抄写和造句。每一排推举一个人造好的句子，当众朗读。当天的授课者是一个长得漂亮，上课技巧也很不错的大三学姐，上课完全不会有卡壳或者尴尬的地方，效果和课堂的氛围非常好。J第一个造句，大家集体发出赞赏的声音。其他的说出来的句子也应该都不错，大家会一起鼓励。最后，有人上去讲了讲关于历史的东西，并邀请大家上去发言。一个大一的女生上台发言的时候有些紧张，一开始说的连词和数字都是错的，大家集体纠正她，她说了三次才说对。

与其它的聚会形式不同，认真严肃的藏语课给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上课式的聚会形式没有了聚餐、游戏、舞蹈与欢笑，有的是认真学习的态度与对未来的规划。在很多老师、同学包括藏族学生自己的心目中，都会认为他们是缺乏上进的、缺乏节制的，喜欢玩乐、喝酒等，但至少在这样藏语课的形式下，藏族学生可以远离那些东西。

事实上，这样的藏语课并不仅以教授藏语为唯一目的，也是为了培养他们的族群意识，让他们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藏语课的主要组织者也告诉我们，并不指望大家对这些词汇能掌握多少，日常大家为了方便还是会夹杂着汉语，但至少给大家一种讲纯藏语的意识，至少大家在上课的那段时间可以讲藏语。一位藏族学生说到，他们所在的S市其他高校的藏族学生举办的晚会竟然用汉语报幕，或是藏语报幕做的不够好，但是E大会特别注意这一点，晚会一定会用准确的藏语报幕（书面藏语的语法并不简单），还会特意在晚会中穿插和藏语相关的小游戏。这也可以视为藏语课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我们也发现，在藏语课前与课后的聊天中，他们的话题少了平时的调侃与轻松，更多的会与西藏的现状与未来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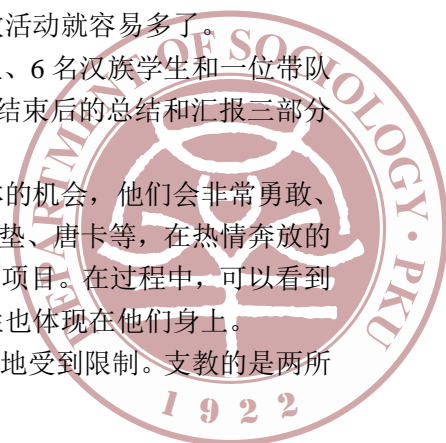
如果说藏语课是E大藏族学生在学校内部“复兴藏族文化”的努力，那么，支教则是他们把自己的知识文化带回家乡，为家乡做贡献的过程。最早的支教是在2011年做起来的，由09级和10级的学生牵头。09级的总负责人在跟我们谈起为什么想要开展支教活动时说，自己从学校回家的时候，看到在火车上看到这头上海这么繁华，都是高楼大厦，但回到自己家，看到草原上的牧民，虽然家里牛羊很多，但没有什么文化，不会理财，生活的不好。很多孩子不上学，所以很想做一些事情。

在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下一步便是寻找赞助。他们去找在上海开藏餐馆的老板，别人不愿意把钱给他们，又去找其他人，也没有成功，几经周折，他们最终获得了学校学工部老师的支持。第一年就这样成型，有了资源和项目运作的模式，接下来几届的支教活动就容易多了。

研究者参与了2012年暑假的支教活动，支教队由16名藏族学生、6名汉族学生和一位带队老师组成。整个支教项目由准备（人员、课程、筹款）、支教、项目结束后的总结和汇报三部分组成。

出行前，藏族学生会举办义卖会。义卖会也是一个展示藏族群体的机会，他们会非常勇敢、自信、骄傲地介绍自己民族特色的商品，如小饰品、披肩、藏香、卡垫、唐卡等，在热情奔放的民族音乐中时不时地跳起舞，拿着捐款箱向路过的师生介绍这个支教项目。在过程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本民族的那种骄傲、认同。奔放、热情、善良的藏民族特性也体现在他们身上。

由于支教项目参与了学校官方的项目，行程和学校的选择也相应地受到限制。支教的是两所



小学，上课的时间也只有一周左右。比起文化课的知识补充，支教带给那些孩子更大的影响是外面的世界，告诉他们上海是什么样的，外面是什么样的，让他们可以使用普通话和来自西藏之外的我们沟通。藏族学生利用课上的时间讲述他们自己从小考上内地班的经历，怎样克服困难努力学习，考上内地班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资源，对于孩子们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支教的经历锻炼了藏族学生的活动组织能力与授课能力，也让平时可能不是那么熟、不同年级的藏族同学（平时大家的知心朋友也就是三五个）可以朝夕相处，更加了解对方。在支教的过程中，他们可以真正地走上讲台，真正地帮助到那些孩子，被孩子们所喜爱，让他们认识到教师这份工作的重量，让长久远离家乡的他们感受到他们与家乡的关系不只是与亲朋好友的关系，更有一份对于家乡的责任感。接下来再回到校园里学习时，他们将更意识到自己在教师这份职业的不足之处在哪里。一位参加支教的同学曾说：“我们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来。”这句话可以说概括了他们的心声。

另一项与他们的“双重身份”，即藏族与免费师范生相关的，则是他们在大四的时候举行的实习交流会。按照学校的研究，每年12月之前，所有大四的学生都回原籍所在地参与教育实习，进入中学担任实习老师，然后再回到学校完成最后的学业。在回到学校之后，通常会由学工部出面组织一次实习交流会，由每一个师范生分别上台分享他们在实习中的收获，并提醒学弟学妹们要注意的东西。在实习交流会上，他们所用的语言均为藏文。

实习交流会上最重要的，自然是教师技巧的传授。研究者参与的那一次交流会上他们提到的技巧主要分为几个方面：多读书（储备各方面的知识）；教学技能的培养（利用好“微格”课程¹）；学好专业课的知识；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藏语。除教学技能以外，在实习过程中与学生和老师处理好关系，也是实习归来的大四学生认为重要的东西。与学生相处时，需要保持好一个度，不能过度亲密；要多鼓励学生，不能看不起他们；和老师相处时，也要保持一个度，不能过度亲密；和刚参加工作的老师要多聊天，因为他们更了解找工作和考试的情况；和其他实习老师在一起的时候要勇于表现自己，不要害羞；学好运动，如篮球，还有跳舞，这样可以展示自己，在其他学校的师范生中脱颖而出。事实上，在师范生回西藏工作时有一定的选拔制度，想在好的地区当老师需要通过统一的考试，可以看到，大四的学生面临着一定的就业压力。

在谈论到老师要对学生有耐心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实习交流会上，是研究者除私下交流以外，第一次听到藏族学生谈论到涉及到汉藏民族间的问题。有好几位同学都提到老师对学生要有耐心，因为学生年轻、容易冲动，留在西藏读书的学生基础比较差。有一位女生在发言时提到，虽然那些学生基础差，但是我们不能像汉族的老师那样骂他们笨、骂他们是猪，这样很伤自尊。可以看到，在藏族学生心中，也感知到了汉族人对他们的歧视。虽然这种歧视发生的场所不是他们所在的E大，他们也并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谈论，但这种被歧视感客观上也强化了他们的族群意识，使他们有意识的强调自己与汉族的区别。

在报告的过程中，许多人都表示了作为E大学生的自豪感，尤其表现在日常与其他学校的实习生共处的时候。如一位女生提到，某一所师大的男生晚上还会跑出去到外面的网吧去打游戏，但E大的学生就不会。在教学的能力上，一位男生在讲到自己除了上本专业的化学课，还带了数学课，说E大的学生就应该这样，引起了台下大家的阵阵掌声。事实上，E大的藏族学生多、关系团结，在S市的藏族学生群体中口碑最好，在全国几所内地西藏高中班都是很受好评的。一位大一新生甚至向研究者表示，自己选择E大而不是另一所优秀的师大就是因为E大的藏族学生出名的团结。可以说，身为E大藏族学生中的一员，他们是感到骄傲与自豪的，这种自豪感也进一步促使他们维持自身的族群形象，使族群的凝聚力与族群成员的认同延续下去。

¹ 微格教学即通过录像的方式记录师范生的教学过程，对其教学技能进行纠正的课程。



三、总结

在前文中，我们描述了 E 大的藏族学生如何在校园环境中形成自己的族群认同，并在实践中不断巩固这种认同，强化自己的族群边界。在此前关于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研究中，有数位学者借用贝瑞（John Berry）提出的文化适应的四种模式（融合、同化、分离、边缘化），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过程进行了研究。¹这些研究或是认为四种模式会出现在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校的不同阶段，或是认为不同的学生会倾向于采取不同的模式。如果按照这四种模式对 E 大的藏族学生进行考察，我们可以说，他们大体采用的是介于“融合”与“分离”之间的模式，即首先认同自身的民族文化，保存自己的族群身份，接下来，在某些时候与汉族文化融合，在多数时候则倾向于独立于主流文化群体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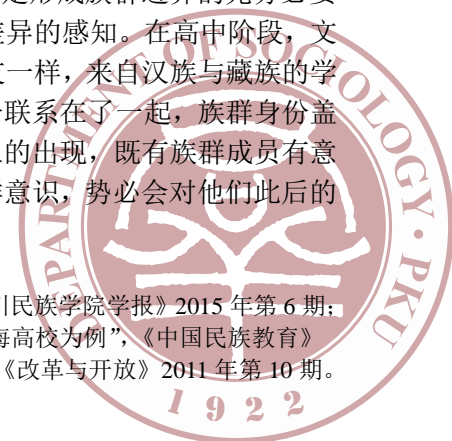
事实上，这些学生所处高校的具体社会情境，也对这种群体交往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此前的家乡生活与内地西藏班中，这些学生处于相对熟悉的环境，他们只需要专心学习，也没有其它方面的更多需要。然而，在进入大学之后，他们要面临全国各地以汉族学生为主的环境，要面对寝室里朝夕相处的汉族学生，高校生活也不再以应付考试为唯一的目标，他们也会有人际交往、自我实现等各方面的追求和需求。在这个时候，他们便需要有意识的选择自己的交往策略。

“藏族学生”与“免费师范生”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毕业后都一定要回到西藏工作。那么，从现实角度考虑，既然他们只是短时间居住于内地，也就没有“融入内地人的生活，在内地积累人脉”这样的需求。面对有文化差异的汉族学生，他们自然而然“知难而退”，选择保留原有的习惯，和本民族的学生相处。

在整个大学生活中，他们面临的问题既有与其它汉族同学相同的共性，也有作为藏族学生与免费师范生的特殊性，然而，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却并非个体化的，如寻求家庭帮助或老师辅导，而是集体性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感受到了藏族群体的温暖，也对这个群体产生了越来越强的依恋，并愿意为这个群体付出更多。可以说，大学阶段是一个人生命历程中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阶段，而族群身份也是自我身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这种族群身份成为个体重要的身份标签的时候，个体便会感受到来自于周围的压力，倾向于形成族群内部的团结，排斥族群外部的人。这个过程，对于藏族学生来说是如此，对于汉族学生来说也同样如此。在与“他者”共处的情境下，这些藏族学生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了“自我”，并在同样身份的基础上凝聚成了紧密的整体，有意识的划分族群边界，也形成了与族群身份相关的责任感。从长远来看，职业发展轨迹的限制虽然为他们提供了“铁饭碗（虽然也不一定是牢固的）”，但也限制了他们真正融入内地的可能。

这些藏族学生在来到 E 大之后，族群意识有一个逐渐萌发增强的过程，与汉族之间的族群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他们的族群意识，既有“原生”的藏族成分，也有与他们特定身份相关的成分。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在高中阶段在散插班（成绩非常优秀的同学进入当地汉族学生的普通班级学习）就读的同学告诉研究者，他高中阶段最好的朋友就是汉族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却没有办法跟汉族做很好的朋友。如果说汉藏之间的文化差异在高中与大学阶段都是同样存在的，那么，这位同学的切身经历便值得我们反思。事实上，文化差异并不是形成族群边界的充分必要因素，族群身份的固化，主要是源自族群内外在新的社会情境下对差异的感知。在高中阶段，文化差异还基本是个体化的，就像来自不同区域的学生可能成为好朋友一样，来自汉族与藏族的学生也可能成为好朋友；然而，到了大学阶段，文化差异却与族群身份联系在了一起，族群身份盖过了其它的身份，形成了排外的社会边界。正如前文所言，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族群成员有意识的创造，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在非常重要的大学阶段形成的族群意识，势必会对他们此后的人生产生重要的影响。

¹ 见吴儒练、徐长山，“融入与重塑：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周源源、洪汉英，“内地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适应的现状与对策——以上海高校为例”，《中国民族教育》2016年第1期；王毅，“文化适应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影响及对策研究”，《改革与开放》2011年第10期。



【编者按】

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是实证调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敢于直面一切我们愿意看到或不愿看到的现实社会问题。

为了认识和理解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对相关人员进行接触并开展深入访谈，通过这些交流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也许他们在谈话与表述中带有某种情绪，言词有些偏激，观点并不正确。社会中一些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思想认识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也十分正常。研究者可以通过交谈，更进一步了解对方所持观点的信息来源、理解他们的思考逻辑、分析如何才能使他们比较客观地分析社会现象，逐步引导他们在正确的思路思考问题。采取“鸵鸟政策”、回避或漠视这些现实问题，不仅无益于这些问题的正确引导和早日化解，反而会造成一些错误观点的继续蔓延传播，对社会造成更大的隐患。如果采取简单的做法予以排斥，则可能激发反弹甚至激化矛盾，更不利于矛盾的化解。

我们在《通讯》中介绍一些关于青年或在校学生的访谈报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信息，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青年学生的现实思想状况。

【调查报告】

部分维吾尔“民考汉”在校大学生对一些问题的认知 ——基于个案访谈的分析

唐元超¹

所谓“民考汉”是指自幼上汉语学校并用汉语与汉族学生一样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少数民族学生，后来泛指一切上汉语学校的民族学生；与之相对的概念是“民考民”（迪木拉提，2001）。随着新疆双语教育的发展，“民考汉”群体数量也在不断增加²，因其在理论上作为“维-汉两种文化”的承载者和“多元族体资格”的行动者而备受关注。³一些学者归纳了这一群体在对待语言文化上的矛盾性，表明其存在“逆向文化冲击”的尴尬，同时利用心理学的方法证明了“民考汉”群体存在内群体的认同和我文化的偏好，试图为被贴上“汉化”标签的该群体“辩护”（孜维达等，2014）。也有学者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该群体作为文化“边缘人”和“中间人”的两种面向，指出因基于民族身份的制度安排使得该群体虽然融入了主流社会，但依然保有其族群性基础（祖力亚提，2009a）。还有学者利用“知识分子亚社会”的理想型对中国各民族知识分子的培养体系发问，“中国各族的知识分子们是否在知识学习和文教科技事业的工作中获得了超越‘族群意识’的更高层次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是否构建出一个超脱本族群利益和传统思维的‘知识分子亚社会’”？表示了对于我国民族教育体系在知识分子培养方面的深切忧虑（马戎，2013a）。

显然，在目前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今天，大家（无论是维吾尔族还是汉族）都更关心“民考汉”这一群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急切地想要获知这一群体“忠诚”于谁，作为民族

¹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² 2015 年，新疆全区学前和中小学（含职业高中）少数民族接受双语教育和“民考汉”的学生 224.93 万人，占该年学前和中小学少数民族在校学生数的 78.85%；而双语教育和“民考汉”的学生比例在 2010 年时为 48.0%。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http://www.xjedu.gov.cn/xjjyt/sytj/index.htm>

³ 这里之所以强调在“理论上”的可能，是因为“民考汉”群体内部的地域、阶层、社会化的基本场景（学校、专业等）以及其他因素的多样而表现出强烈的内部差异性，在“实际中”是否可以发挥这一作用则需要进一步论证和分析。

